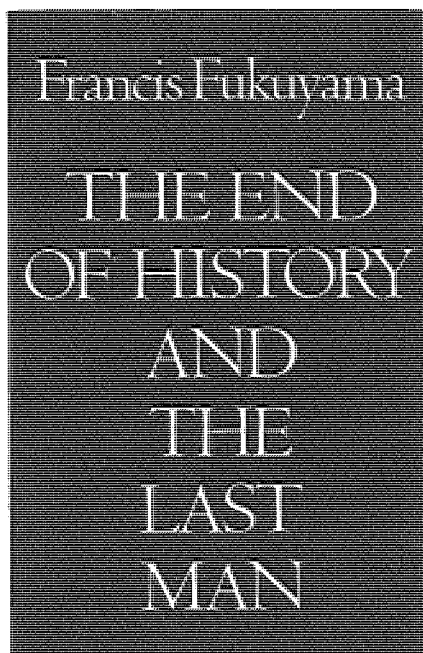


「歷史」的民主與 民主的「歷史」

• 鄒 剛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1989年夏季號的美國季刊《國家利益》發表了一篇以〈歷史的終結〉為標題的轟動性文章。文章的作者是當時在美國國務院政策計劃

課任副課長的美籍日裔官員富山。在這篇文章中，「歷史」是指人類在追求理想社會制度過程中意識形態的衝突與演化。在他看來，封建主義、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先後敗於民主意識，隨着全球對民主意識的認同，他所定義的「歷史」以民主的全勝而終結。

這篇轟動一時的文章立即引起左右兩方面的批評。富山文章刺激性很強的標題，和他過於簡單化的分析成為這些批評的共同焦點。富山的新作《歷史的終結和最後一個人》似乎正是對這些批評的一種回答。現年39歲的富山一舉成名後，放棄了他在美國國務院的工作，轉到蘭德公司，用一年多時間完成了這部幾乎同時用14種語言出版的著作，引起世界出版界的轟動。

富山的研究進路

富山新作的標題刺激性更強，但他的分析顯然不能再看成是「簡

單化」的。在這本書中，歷史是定義在黑格爾(Hegel)哲學體系之上的。黑格爾認為歷史是精神與意識的展開和自我實現過程，推動歷史前進的力量是人類對自身價值和尊嚴的自我認識的追求。富山認為正是這種認識過程中的競爭，引起了各國社會制度的演化。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為自己的民眾提供了平等的認識機會，因而成為人類社會制度演化的共同和終極目標。人類在社會制度上認識的同化，最終將結束人類社會制度演化的「歷史」。

該書的另一半標題——最後一個人——給出這種「宏觀」歷史終結的「微觀」機制。富山認為，人在自我認識過程中的追求無非是財富與自由。市場經濟和自由民主相結合的資本主義制度恰好同時滿足了個人對這兩方面的追求。富山借用了尼采(Nietzsche)對「最後的人」的定義，來解釋歷史終結的微觀機制。尼采曾提到「人在滿足所有幸福之後，將停止自身的奮鬥」。富山認為，人在滿足了包括民主在內的所有需要後，將放棄對自我認識的努力。一定社會人文歷史的演化和積累，將在其最後一個成員也成為這種「滿足」的人時而終結。

富山不是僅僅借用了黑格爾和尼采的術語，他為讀者編織了一幅人類認識過程的宏大的歷史畫面。這部分成31章的著作用了很大的篇幅評述從柏拉圖(Plato)以來的主要思想大師。和西方民主理論史學者截然不同，富山的分析從安格魯(Anglo)民主理論大師霍布斯(Hobbes)與洛克(Locke)，跳到普魯士哲學大師黑格爾和尼采。二十

世紀熊比特(Schumpeter)、德爾(Dahl)等民主理論大師的著作被忽略，而名不經傳的法籍俄裔黑格爾學者柯契夫(Kojève)在富山的著作中成為當代民主意識的主要人物。

富山的分類綜述是極其新穎和具有挑戰性的。這種分析路線反映了他對相對主義的批判。將安格魯的民主理論與普魯士的意識哲學相連結，如同移花接木。黑格爾的學說作為一個完整的體系，與霍布斯的民主理論的洛克的唯物主義並不存在繼承與發展的關係。事實上，黑格爾哲學的重點是研究自由，或自我意識的實現。自由與民主是相互關聯但並非等價的概念。民主在黑格爾的體系中始終沒有佔有如同自由這種範疇的地位。黑格爾也沒有將自由與民主連結在一起，作為完整的「自由民主」的哲學範疇。

尼采對最後的人的描述雖然從邏輯上正好可以用來「終結」歷史，但是，尼采的學說從體系上說與黑格爾大相逕庭。尼采的鼻祖是黑格爾的直接對立面叔本華。叔本華與黑格爾相同之處在於唯心主義。但是，叔本華的唯意志主義(voluntarism)與黑格爾的「自我意識」截然不同。叔本華極力反對黑格爾體系的理性色彩，尼采將叔本華的學說發展成反理性主義的「衝力意志」。「最後的人」是尼采建立在衝力意志之上的「超人」學說的組成部分。尼采的這一套理論與黑格爾認識論的理性學說可以說是直接對立的。

將尼采的哲學當成完整的體系來看，與其說他發展了民主意識，還不如說他推進了權威理論。尼采

富山認為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為自己的民眾提供了平等的認識機會，人類在社會制度上認識的同化，最終將結束人類社會制度演化的「歷史」。

富山認為，人在滿足了包括民主在內的所有需要後，將放棄對自我認識的努力。一定社會人文歷史的演化和積累，將在其最後一個成員也成為這種「滿足」的人時而終結。

富山對民主意識的綜述實際上反映了他保守主義的觀點。

歷史並未終結



強調權力意志是「不竭的創造性的生命」。他主張國家應該成為「超人」的統治工具，並反對當時資本主義自由民主的思潮。尼采認為這種普選制下的自由民主將導致專制的出現。在這點上，柯契夫繼承了尼采的立場。柯契夫曾不止一次地欣賞斯大林統治的效率，並宣稱50年代的美國、蘇聯和中國在統治程度上是沒有區別的。被廣泛認為是新權威主義鼻祖的亨庭頓(Huntington)，直到1968年才將類似的觀點作為《社會變遷中的政治

秩序》一書的開篇立論。

由此看來，富山作為「歷史」的民主並沒有告訴讀者民主的「歷史」。富山對民主意識的綜述實際上反映了他保守主義或「新」保守主義的觀點。保守主義或新保守主義不過是民主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一種階段性理論。民主的起源遠比富山的總結要深遠，同時它的發展不會在保守主義還存在的階段就終結。用形象的說法來描述當今世界的變化固然是生動的，但是將此上升為理論是不適宜的。理論分析最忌先作結論再求證的傾向。將歷史的終結作為定案，再將歷史上思想大師的學說填進這一框架，必定是削足適履。與其匆忙去終結歷史，還不如平心靜氣地探討包括保守主義在內的各種意識形態在民主發展歷史上的作用和地位。

民主的發展史

遠在民主意識能用文字表達之前，民主就已經存在了。原始社會是民主制度的第一次出現。儘管這種沒有私有產權的原始社會是民主發展的初級階段，原始社會的民主制度卻包含了人類迄今沒有達到的最高民主形態——直接民主。民主意識的發展是從原始社會的解體開始的。從某種意義上看，古希臘民主制度繼承了原始社會直接民主的精神，而古羅馬第一次引入了代議制的間接民主。羅馬法典也是人類歷史上第一部含有保護私有產權的法規。那一時代的人是本來可以在滿足財富與自由雙重需求下來終

結歷史。然而事實上是民主發展的歷史反而以封建主義的全勝而中斷。

在資源稀缺的條件下，私有產權的產生和分配使自由與民主第一次陷入矛盾，和柏拉圖的《理想國》不同，亞里士多德(Aristotle)首先注意到這個二律背反。在他看來民主與財富的分配是矛盾的，這是因為窮人總是多數。民主意味着對財富的侵佔，從而破壞了自由的基石。在不能解決他的二律背反的情況下，亞里士多德選擇了貴族少數人統治的形式作為民主制度的基礎。和他預見的一樣，這種統治走向了中世紀漫長的專制。

霍布斯和洛克注意到貴族民主的局限性，同時他們也探討了自由與民主統一的可能性。但無論是霍布斯還是洛克都沒有解決自由民主倫理上的優越性與實踐上的不可操作性的矛盾。特別是洛克理論的兩重論，使他的論著成為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兩大民主理論派別的根源。盧梭(Rousseau)和杰佛遜(Jefferson)發展了洛克學說中自由主義的一面。他們認為自由民主只能在普選制下的均等社會才能實現。然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發展有可能成為人間不平等的起源，因此必須加以限制。

保守主義的代表人物有美國聯邦政府第一任財長哈彌爾頓(Hamilton)、聯邦黨領袖亞當斯(Adams)以及人權法案起草人麥迪遜(Madison)。他們認為沒有限制的大眾民主將導致對財產關係的損害，從而阻礙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發展。因此限制選舉權的擴大是保

護私有產權和自由的必要措施。

與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不同，邊沁(Bentham)和穆勒父子(James Mill & John Stuart Mill)提出了一種折衷方案。他們同意普選制下的自由民主為終極目標，但作為過渡，政府可以先擴大選舉權到少數受過教育的中、老年窮人，或者讓受過教育的公民享有多於一票的選舉權。

民主與自由的協調是十九世紀70年代以後的現象。議會政黨的出現，使得男性公民普選制變得可以操作並得以迅速推廣。市場經濟和自由民主相結合的自由資本主義社會，在那一時代應該能滿足人對財富和自由的雙重需求。然而歷史又一次錯過了終結自己的機會。市場經濟不能防止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進而向帝國主義的過渡；法西斯主義的政權誕生於普選權下的自由民主國家，與「歷史的終結」相反，當時轟動的發現是「自由放任」的終結(the end of laissez-faire)。

正如普蘭尼(Polanyi)在半個世紀以前的著名作品《偉大的轉折》中指出的，「自由放任」的經濟—政治制度的崩潰，使得「新政」、法西斯主義和社會主義作為三種替代的社會發展方向。當代的工業社會仍然生活在「新政」後的時代。事實上，經薩謬爾遜(Samuelson)創立主流新古典綜合派後，混合經濟已代替以往教科書中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用以反映「新政」前後經濟體系的變化。

從另一方面看，民主理論自本世紀中葉以來也有了較大改變。其

市場經濟不能防止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進而向帝國主義的過渡；法西斯主義的政權誕生於普選權下的自由民主國家，與「歷史的終結」相反，當時轟動的發現是「自由放任」的終結。

普蘭尼指出「自由放任」的經濟—政治制度的崩潰，使得「新政」、法西斯主義和社會主義作為三種替代的社會發展方向。

代表性學說包括熊比特建立在政治市場上的「精英民主」理論，和德爾從結構主義發展出的「多元民主」理論。同一時代柯契夫的哲理與這條主線是沒有聯繫的。但是柯契夫的思想與60年代末的新權威主義和70年代中的新保守主義倒較為一致。更精確一點說，柯契夫與50年代保守主義代表人物柏柯利(Barkley)的觀點相類似。70年代以後，他們的思想發展成新保守主義。代表人物有摩格尼漢(Mognihan)、格萊塞(Glazer)和克里斯特爾(Kristol)。新保守主義認為美國60年代民權與反戰運動帶來了無政府主義。政府應節制民主和公民對政治的興趣，建立和恢復民主政治能穩定發展的秩序。

歷史沒有終結

二十世紀民主在理論和實踐上的進步顯然沒有終結民主的歷史。8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的一些政治和未來學學者注意到民主國家參加政黨和政治性投票的人數愈來愈少，公民對政治參與的意識愈來愈弱。未來學學者認為幾個世紀以來的代議制式的間接民主已經不適合後工業社會，新技術革命後的社會使得非政黨化和非政治化的直接民主成為可能。當代著名民主理論家麥可費遜(Macpherson)將這種公民對公共事務直接參與的民主模型看成民主歷史的下一個階段。如果黑格爾的哲理可以用來解釋民主的歷史的話，民主制度的演化也許能以回歸並昇華到直接民主而終結其

發展過程的第一個否定之否定。

然而即使從黑格爾的唯心主義哲理出發，民主意識的展開也必須從其與塵世結合的過程中得解釋。幾乎與富山著作同一時間，亨廷頓(Huntington)推出了論述本世紀民主發展《第三次浪潮》的研究。與富山意識導向的研究截然不同，亨廷頓側重於解釋「塵世」中民主發展的歷史。他認為民主的第一次浪潮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末。然而，從1910年到1931年出現的17個民主政體中，只有4個經過了20、30年反民主力量的衝擊。

民主的第二次浪潮源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末。而第二次反民主傾向出現於本世紀60年代。1958年32個民主國家中，有三分之一在70年代中期回到專制政權。不言而喻，當代世界的變化，被亨廷頓稱之為民主的第三次浪潮。但是，亨廷頓顯然不認為民主的「歷史」將終止於這一次浪潮。相反，他預測本世紀90年代後期，有可能出現另一次民主的反覆。反過來看，這種反覆也不可能結束作為「歷史」的民主。亨廷頓總結全書的預言是：「90年代的反覆不可能阻止二十一世紀中將到來的民主的第四次浪潮。」

鄒剛 世界銀行博士後邁克邁馬拉研究員。著有 *Growth with Development*，合著有《開放條件下的比較利益研究》、《中國微觀景氣分析》，曾發表中英文經濟學論文數十篇。

未來學學者認為幾個世紀以來的代議制式的間接民主已經不適合後工業社會，新技術革命後的社會使得非政黨化和非政治化的直接民主成為可能。